

国内外高等教育动态

2018年第5期(总第62期)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高教研究所编

2018年6月15日

本期目录

● 宏观政策.....	1
聚焦高校党建 教育部全面部署质量提升攻坚行动.....	1
雄安新区: 优先发展现代化教育路径选择.....	2
● 热门动态.....	5
高校“双一流”建设: 从美国高校看“四个回归”.....	5
“大通识”补齐本科专业教育短板.....	6
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项目“量、质共变” 加快促进新工科建设.....	8
“双创”教育须打破“标准答案”思维.....	9
研究生选拔坚持开放多元是公平之需.....	11
中国内地6所高校跻身世界大学声誉排行榜百强.....	12
熊丙奇: 不要以高校预算收入多少论“英雄”.....	13
● 聚焦院校.....	15
全国30所能源类高校“牵手”成立共青团工作联盟.....	15
中南大学: 推进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	16
四川大学: 打好提高思政课质量和水平攻坚战.....	17
清华将启动“写作与沟通”必修课 2020年覆盖所有本科生.....	19
安徽财经大学: 借力“新工科”, 建设“新经管”.....	19
● 纵览全球.....	21
国际化——新的声音、想法和方法.....	21
澳大利亚: 教师是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关键因素.....	22
剑桥大学公布2017年招生统计数据.....	25
申请人数下降, 美国大学推出全球奖学金.....	26
大学分数通胀问题正在向全球蔓延.....	27
印度: 通往可持续发展的一流大学之路.....	29

● 宏观政策

聚焦高校党建 教育部全面部署质量提升攻坚行动

为全面提升高校党建质量、写好教育“奋进之笔”，昨日，教育部在京召开“奋进之笔 1+1”第三场发布会。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司长张东刚表示，今年确定为教育系统党建质量年，教育部党组部署全面实施“基层党建质量提升攻坚行动”。

根据行动安排，教育部党组近日印发《关于高校党组织“对标争先”建设计划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对标争先”实施意见》）和《关于高校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育工程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双带头人”实施意见》）。

首批“十百千万”工程将于下半年开展

张东刚表示，《“对标争先”实施意见》是写好教育系统党建工作“奋进之笔”、提高高校党建工作质量的总体抓手，是深化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推进“双一流”建设的重要保证，是落实部党组“耳提面命”工作责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高校基层延伸的有效途径。

张东刚强调，《“对标争先”实施意见》中最重要的举措是实施“十百千万”工程。教育部计划以两年为一个周期，面向全国高校培育创建 10 所党建工作示范高校、100 个党建工作标杆院系、1000 个党建工作样板支部，培训万名基层党组织书记，首批“十百千万”工程培育创建工作将于 2018 年下半年开展。同时，张东刚还指出，此项工作已纳入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专项经费保障。

首批“双带头人”工作室建设将于年内启动

“《双带头人》实施意见》是加强高校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的实举措，也是实施“对标争先”建设计划的突破口。”张东刚表示，“双带头人”即推动高校教师党支部书记普遍成为党建带头人和学术带头人。文件确立了“力争在 2020 年底前，基本实现双带头人支部书记选拔方式全覆盖，使教师党支部书记普遍成为双带头人”的工作目标。

张东刚指出，教育部计划以 3 年为一个周期，面向全国高校，支持建设一批“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开展理论和实践探索，健全完善“双带头

人”教师党支部书记选拔、培养、使用的体制机制。首批“双带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工作室的建设将于年内启动。

各高校多元探索提升党建质量

当前,全国各高校聚焦提升党建质量展开一系列工作。北京林业大学围绕“让党课触及灵魂,让有意义的事有意思有价值”目标,探索形成沙龙式、盲评式、分享式等8种党课新模式,致力于实现“人人参与、共同提高”目标。

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党委在“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中,组织师生分东北、西南、东南三条线路,走访航空、能源、军工领域的6家骨干企业,开展联合组织生活,学习国企党建经验,注重发挥实践育人作用。

自2012年起,华中师范大学开始探索实施教师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育工程,选优训强党支部书记,目前全校“双带头人”比例已达到100%。除采用传统方式,华中师范大学还充分运用“互联网+”党建平台,采用支部书记微党课、支部风采微展示等新颖方式,旨在使“双带头人”在党务上有能力、业务上有建树、师生中有影响。(来源:人民网,2018-05-29)

雄安新区：优先发展现代化教育路径选择

雄安新区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地,将成为北京发展新的一翼,承担解决北京“大城市病”的历史使命,成为新的区域增长极。推进雄安新区建设需找准抓手,厘清建设次序,坚持公共服务先行。

以优质公共服务资源集聚为先手棋

比较而言,河北省城市群的公共服务体系与京津两地存在较大差距。从资源流动看,京津对河北的“虹吸效应”明显。近年来,三地的发展差距并没有缩小的趋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目前京津冀三地发展差距较大,不能搞齐步走、平面推进,也不能继续扩大差距,应从实际出发,选择有条件的区域率先推进,通过试点示范带动其他地区发展。”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

良好的人居环境是雄安新区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要前提。新区吸引在京相关单位、产业和人口转移,前提条件是具备与首都相媲美的优质公共服务

体系。雄安新区现有开发程度较低，公共服务设施比较薄弱，新区建设有必要以优质公共服务资源集聚为先手棋，尽快建成公共服务高地。新区建设亟待做好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完善公共服务网络，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吸引高端人才集聚，吸纳创新要素资源，发展高端高新产业。

推动京津优质教育资源向新区布局发展

教育是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区域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全局性和基础性的作用。当前，雄安新区是教育资源布局的洼地，要对非首都功能疏解产生吸引力，必须推进重大项目合作，引进京津优质教育资源，尽快提升新区教育整体水平。

2017年8月，北京市与河北省签署《关于共同推进河北雄安新区规划建设战略合作协议》。北京市承诺采取“交钥匙”工程方式，在雄安新区投资建设高水平幼儿园、小学、完全中学各1所，建成后移交雄安新区，由新区委托北京一流的教育集团进行管理。2018年3月，两地开始实施首批援助办学项目，北京市六一幼儿院、中关村第三小学、朝阳区实验小学、第八十中学分别对接雄县幼儿园、雄县第二小学、容城小学、安新二中，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向雄安新区布局发展。这种跨域合作为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提供了新的典范。

雄安新区发展高等教育，也需要京津两地著名高校提供有力支持。大学是城市的思想库和动力源，对于城市可持续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意义。推进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三地有必要深化高等教育合作，支持有条件的知名高校通过搬迁、办分校等方式向雄安新区疏解，拓展办学空间，支持京津冀院校之间通过共享教学资源、共享实习基地等方式，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政策执行路径选择上的几点建议

第一，出台引导性政策，支持著名高校在新区办学，设立新校区、分校或研究生院。作为推动科技发展、传播思想文化、弘扬人文精神的重要载体，大学与城市发展共生共荣、交相辉映。北京市拥有多所“双一流”建设高校，集聚了大量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雄安新区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集中承载地，其引入优质教育资源，宜采取增量疏解为主，即支持“双一流”建设高校到雄安设置新校区、分校或研究生院。教育行政部门提供激励机制，出台相关政策，引导在京

高校调整发展布局。例如，通过控制在京高校招生规模，对雄安新区办学提供专项指标支持，引导在京高校优化专业设置，积极拓展新的办学空间。

第二，坚持高点定位，创建一流水平的雄安大学，为新区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雄安新区定位为创新发展示范区，一流的创新需要一流的大学。作为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雄安新区的高等教育布局有必要坚持两条腿走路，既要引入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建设著名高校、科研机构的分校、分院，也要立足自主发展，建设世界一流的雄安大学，为城市发展打造一张亮丽的高等教育名片。组建雄安大学需要坚持高点定位，培育一批优势学科和研究中心，发挥其在集聚人才、学科、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在雄安大学创建的早期阶段，有必要引入共建和对口支持机制，推进与著名高校的校际合作，尽快提升主要学科的办学和科研水平。

第三，推进政府间合作，在雄安新区创建一批高水平的幼儿园、中小学校，提升新区基础教育水平。疏解北京市非首都功能，由雄安新区进行集中承接，这不仅涉及相关单位转移，也涉及一定规模的人口迁移。为此，雄安新区需要与北京市有关部门开展深度合作，引入优质教育、医疗、文化等资源，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完善配套条件。其中，教育设施建设和优质资源共享尤为迫切。新区只有具备与北京大体相当的基础教育水准，才能确保疏解对象来得了、住得牢、发展好。为保障引入的优质教育资源可持续发展，新区基础教育也要创新办学模式，引入托管、集团化办学、国际化办学等方式，由知名学校派出优秀管理团队，通过教师互派、课程共享、教学资源共享、人才培养、技术帮扶等形式，提供合作办学支持，改进新区教学管理，提升基础教育品质。

第四，增进干部人才交流，为雄安新区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有赖于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在新区建设起步阶段，京津冀三地既要推动重大项目合作，也要全方位开展干部人才交流。从2015年开始，北京市和河北省合作启动了京冀“双百”互派干部挂职项目，每年互派百名干部到对方相关部门挂职。除了机关干部挂职交流之外，有必要进一步推动教育、医疗等领域的人才交流，通过人才派出、挂职交流、对口帮扶、培训学习等方式，引入先进管理理念，学习新的教学模式和方法，为加快发展提供智力和人才支持。根据新区发展需要，还可通过人才委托培养方式，依托京津地区高校和培训机构，有针对性地为雄安新区培养急需紧缺人才。（来源：中国教育报，2018-05-19）

● 热门动态

高校“双一流”建设：从美国高校看“四个回归”

“在‘双一流’建设进程中，高校要进一步转变理念，做到四个‘回归’，即回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日前，笔者赴美国高校考察，深切感受到陈宝生部长提出“四个回归”的重要意义，并认为美国的高等教育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我们借鉴。

一要回归常识，强化通识教育、为所有学生的全面发展夯实基础。

为学生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是美国高等教育一直坚持，也是国内高等教育所缺失的。美国的基本做法是：注重价值塑造，包括公民意识培养，健全人格养成和人生目标树立；注重能力培养，包括勤奋、韧性、好奇心、想象力、批判性思维等品质与能力；注重核心知识获取，等等。

反观国内部分高校，受应试教育和就业教育的影响，在课程设置上，没有把素质教育和人的全面发展摆在首要的位置；在师资配备上，过分强调科研能力，而忽视了教育教学能力的提升；在评价指标上，将就业率、考研率等指标与招生、专业设置、教学评估、业绩考核等进行挂钩，行政干预过多。这样培养出的学生知识结构不全面、视野狭窄、社会责任感不强。

二要回归初心，充分发挥基层院系和专业教师在学术上的重要作用，催生学校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与我国高等教育治理方式完全不同的是，在美国高校课程的制定和教学计划的实施乃至国际交流领域，专任教师和院系一级的意见是占决定因素的。在美国高校，作为基层学术组织的院系在学校事务中具有广泛的学术自主权，在教学改革、课程设置、学位授予和学术活动的开展等学术方面职权很大。

而国内高校的行政权力占据主导地位，校长不仅是最高行政权力的代表，还是学术权力的核心，除个别领域如职称评审、学位授予由学术机构负责外，高校的学术权力在很大程度上被行政权力所取代；同时，院系作为基层单位，要在学校的集中领导和整体部署下开展工作，在人事、财务、资源配置等方面缺乏相应的自主权。

三要回归本分，培养批判性思维，增强学生辨别是非、求实创新的基本素质。

美国各级各类高校都非常重视学习方式、方法的培养以及多元文化的灌输，重视课堂互动和交流，培养学生理性和客观的思维能力。

美国高校确立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通过采用启发诱导式教学法、介入式案例教学法、以项目带动的批判性思维教学法和“切块拼接式”学习法，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引导鼓励学生从多角度进行理性思考。这是中国高等教育所缺乏的。

四要回归梦想，扎根中国大地，开拓创新进取，办好人民满意的大学。

教育梦就是报国梦、强国梦，具体体现就是“双一流”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奋斗。那么对于高等教育而言，这个初心就是回归教育本质、提高培养质量，这个使命就是扎根中国大地、办人民满意的大学。

目前中国高等教育正在面临由规模发展走向内涵发展、由高教大国走向高教强国的关键时期，发展速度、发展质量令世界为之赞叹、震惊。我们有理由、有信心、有希望，经过长期的努力，一定会实现高教强国的伟大梦想。但客观地看，由于具体国情、管理体制以及发展历史、发展阶段不同，我国高等教育整体发展距世界一流水平尚有差距。我们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妄自尊大，而是要努力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发展之路。（来源：中国教育报，2018-05-7）

“大通识” 补齐本科专业教育短板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快速过渡，在大学教育中加强通识教育已成为研究型大学的共识，但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新建地方本科院校，却在通识教育的认知和实践上，存在着明显的偏差，具有推广价值的通识教育实践更是少见。

在应用型人才培养中，如果通识教育缺失，应用型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就难以实现，以就业为导向，强调职业技能训练的应用型高校也极易“蜕变”为现代职业培训中心，从而使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和能力局限于过窄的范围内，难以形成合理的知识、能力和素质结构。因此，推行通识教育，补齐专业教育的“短板”，

是大学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应然之举。

从我国大学教育的实践看，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是主次关系，专业教育为主，通识教育为次，专业教育因事关学生的就业更受重视。通识教育强调人的全面发展，培养“完整的人”，把专业教育和通识教育融合在一起的专才教育才是合乎新建地方本科院校的培养模式。

观念是行动的先导，大学如何对学生的未来负责？首在育人。深化大学通识教育理念，一方面要深刻把握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养和谐发展的人，而不是培养有用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当前的专业教育存在的弊端，如果教育将每个个体局限在某一狭窄的专门知识里而缺少整体的关照，那么将会给学生的知识、能力、思维和方法带来很大的局限。

要想重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建设是关键。通识教育功能实现的程度，从根本上讲取决于它与应用型人才培养所需专业能力要求相契合的程度。铜仁学院将通识教育界定在“大通识”的概念上，为学生了解历史、理解社会和认识世界提供多种思维方式和广阔教育，帮助学生形成均衡的知识结构。同时，加大通识教育课程在培养方案中的学分比重，构建了“通识+专业+自主+项目”的课程体系，形成了通识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的“山”字型人才培养模式，并新设置了公民教育、科学精神、艺术审美、哲学智慧、国际交流、教师教育6类全校性通识教育模块。

强化通识教育课程管理是提质的抓手。通识教育课程的管理不能只重数量不顾质量。铜仁学院加大对通识教育课程的管理力度，建立健全了包括课程开设、过程管理、质量评价的通识教育课程管理制度，通识教育课程管理逐步规范化、制度化。同时，采取有效措施引导教师开设、学生选择思辨类课程的积极性。对于新申报的通识教育课程，如果教学内容与已开设课程相似，则采用挂牌授课的方式，教师通过各自独具特色的教学风格吸引学生，这样既能给学生提供更多的机会体验其他课程的乐趣，也能提升通识教育课程的教学质量。

学生毕业后面临的是一个充满变数的生活工作环境，只有具备健全人格的高素质公民才能在面对复杂的生存环境时，始终坚守自己的价值追求，做出最有利于社会的选择，这正是通识教育所要实现的人才培养目标。（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2018-05-28）

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项目“量、质共变” 加快促进新工科建设

5月24日，“2018年教育部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对接会”在北京会议中心开幕。对接会围绕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新工科建设、卓越拔尖人才培养、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等主题，组织了专题报告、分领域交流对接、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群交流研讨、产学研合作项目推介展、前沿科技动手训练营等活动，推广校企共建、共管、共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完善校企协同育人机制，为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构建产教融合良好生态。

会上，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指出，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重要使命，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吴岩司长强调，如果把“内涵式发展”简单理解为“从数量到质量”的变化就太浅显了，我们的质量要有灵魂，高等教育要超前谋划、先导发展，领跑更快一点、公平更高一点、内涵更深一点、变轨超车更坚定一点、高教创新更精准一点。

他指出，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在学规模世界第一，2019年将迈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已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红利和牵引动力。眼下，高等教育创新发展势在必行，要全面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等建设，推出“卓越拔尖计划”2.0版，形成覆盖全部学科门类的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专业集群，为2035年建成高等教育强国、实现中国教育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为帮助更多高校和企业开展合作，更好地推进新工科建设，发挥优秀企业和高校的榜样作用和影响力，推广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项目优秀案例的成熟做法和先进经验，对接会上举行了“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项目优秀合作伙伴”“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项目优秀组织奖”颁奖仪式，并公布了“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项目优秀案例”。腾讯、华为、百度、中软国际、谷歌、IBM、德州仪器、艾默生被评为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项目优秀合作伙伴，湖北工业大学、青岛大学、重庆文理学院、常熟理工学院、西安科技大学获得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项目优秀组织奖，20个项目被评

为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项目优秀案例。吴岩司长为获奖高校和企业的代表颁奖。

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项目是教育部为贯彻落实国家相关文件精神，于 2014 年启动实施，旨在以产业和技术发展的最新需求推动高校人才培养改革。搭建校企对接平台，以产业和技术发展的最新需求推动高校人才培养改革。据悉，今年 5 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公布了 2018 年第一批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申报指南，346 家企业发布项目 14576 项，提供经费及软硬件支持约 35.15 亿元。

会议还围绕信息、通信、电子、机械、化工、汽车、建筑、财经、金融、管理等领域开展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对接，企业结合项目申报指南，对项目建设目标、成果要求、参与条件、申报途径等进行详细介绍，与高校积极互动，推动项目落地。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围绕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智能制造、机器人、区块链、微电子、网络空间安全、虚拟现实 10 个方向进行项目群交流研讨，来自高校、企业的多位专家就新工科专业方向课程体系建设、人才培养、师资培训、校企协同等各抒己见、献计献策。（来源：中国教育在线，2018-05-25）

“双创”教育须打破“标准答案”思维

以传授知识为主的传统课堂教学模式，能引导学生获得创新思维与方法，培养出面向世界和未来的创新创业人才吗？在“中国制造 2025”大背景下，社会对高素质“双创”人才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尽管很多高校都组建了创新创业学院，但健全、完善的创新创业教育机制却尚未构建起来。未来，期待更多高校将创新创业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探索产学研用一体化的育人模式，助力“双创”人才成长。

未来的人才需要一种转变思维的能力

“今天的老师有没有思考过这样一个问题：怎样利用过去的知识，教会现在的学生解决未来的问题？”大连理工大学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主任冯林在会上抛出的问题发人深省。的确，随着人们获取知识的渠道越来越多元、便捷，以传授知识为主的传统课堂教学模式正逐渐落伍。“未来的人才更需要一种转变思维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也正是创新创业者所必备的一项重要特质。”

冯林提到，创新创业人才不是靠高校培养出来的，但他们需要在大学阶段打

好基础。“这类人才的特征不在于掌握多少知识、会做多少题，而是拥有一种面对未知领域时，能够探索、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他坦言，在传统的高校育人模式中，很难培养出这样的人。

有专家表示，我们的孩子是从应试教育中成长起来的，大家的目标就是“考高分”，而考高分就要追求标准答案，久而久之，就很容易形成一种固化思维：每个问题只有一个标准答案，而我要找到那个标准答案。但问题是：创新没有“标准答案”。“我们倡导的创新创业教育就是要打破这种思维定式。”

学科壁垒阻碍创业教育交叉融合

事实上，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国内一些高校就开始探索创新创业教育，比如某些技能型大学里出现了创业学院等校内组织，某些职业类院校中出现了“双创”教育中心。后来，越来越多高校组建了创新创业学院。然而不得不承认的是，“创新创业教育”在国内教育界尚不是一个成熟的概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创业教育联盟主席、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徐小洲则认为，眼下我们的创新创业教育仍缺乏特色，每所高校的创新创业教育往往大同小异；而且，目前创业教育师资队伍也有所不足，真正能够走向讲台、走向创业团队的老师相当少。同时，创业是问题导向、项目导向的，而学科壁垒阻碍了创业教育的交叉、融合。

打造大学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创业生态链

那么，高校到底应该如何开展创新创业教育？在专家看来，创新创业教育不应“另起炉灶”，这样容易造成产与教“两张皮”，创新创业教育应当融入高校人才培养全过程，因此要在育人的主渠道——课堂教学中贯穿创新创业的思维和方法。

冯林强调，我们未来的课堂要从以教师为中心转变到以学生为中心，从传授知识为主转变到能力发展为主，从寻找标准答案转变到启发学生的创新思维和批判性思维，从而寻找更多的可能性。现在，全国一些高校正在探索，普遍做法是开设创新创业通识基础课，并在专业课中渗透创新创业思维，同时进行大面积师资培训，因为“老师要先转变起来”。

除了课堂之外，目前在高校中，科研部、科技发展部、实验室设备部、大学科技园等也承担着创新创业教育任务。复旦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总经理王伟表示，

大学科技园在人才培养、技术转移等方面发挥的独特作用。在他看来，作为“最接近市场、最贴近高校”的场所，大学科技园应当和高校的创新创业学院联动建立互动机制，助力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同时推进产学研用一体化协同育人模式的探索。

“如果我们的创新创业教育只是培养一种能赚钱的人的话，那么这种教育体系是谈不上成功的。”在徐小洲看来，今天的创新创业者面向的是未来，为了建成一个整体的创业生态体系，未来的创新创业教育必须坚持打造大学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创业生态链。（来源：文汇报，2018-5-23）

研究生选拔坚持开放多元是公平之需

近期，多家高校优势学科纷纷推出开办暑期优秀大学生专业“夏令营”的消息，针对2019年毕业的优秀大学生，进行为期数天的免费专业培训和学术交流。营员的表现，可以直接作为2019年研究生推荐免试（简称推免）和硕博连读的依据。这种近几年特别受追捧的硕士研究生“夏令营”，连同各种纷纷涌现的招生宣讲信息，已然引发形成了所谓高校研究生“抢生源”的教育热点话题。

硕士研究生招生是我国教育制度的重要构成内容，也是年复一年的高校人才培养工作的关键环节。上一轮的高校研究生招生还没尘埃落定，新一轮的招生工作已经开始，而且各高校为了招到心仪的学生更是“赶早不赶晚”。在国家研究生统一招生考试的基本制度框架下，推荐免试和普通招考是目前硕士研究生选拔的两种主流方式。现阶段，二者明显的区别之一体现在招生对象。推免针对的只有高校应届毕业生，而普通招考方式则包括所有符合条件的应届生和往届生。

热门的保研“夏令营”，其优点在于通过长达数天的近距离综合考察，能够获得较为充分的学术旨趣信息，甚至部分高校在活动结束后就能确定是否录用并签订保研意向书。当然，获得资格参与夏令营的学生，在其就读的本科学校就是优秀学生，所以参与“夏令营”活动的综合表现一般都不会太差。因而，招生单位的年度计划名额和接收推免生的指标数就成为参与学生是否被录取的决定性因素。于是出现了名校推免生数量占招生计划总数比例逐年攀升的现象，甚至有超过教育部所规定的比例要求的趋势。在一些知名高校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中，有的院系大部分招生计划都指向推免生，部分专业明确注明不招收统考生。个别

专业有极少数面向统考生的名额，但也让很多有志于报考的应届和往届生望而却步。

研究生教育作为较高层次的高等教育，尤其是要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生源竞争无可厚非，但推免比例过大，容易造成研究生招生的不公平现象，其合理性需要做进一步评估。很多学生，包括往届的，学习排名不靠前，够不上保研资格的，他们的机会大门已经被关上了，即便再怎么努力也无济于事。这无论是对于个人的发展还是对于国家的选材育才，都绝非幸事。研究生招生上的公平，其要义在于给更多的人公平的受教育机会。

另外一个潜在问题，就是研究生教育的本科化倾向。保研比例过高，可能加剧二者之间的雷同。研究生是本科之后的学历，包括硕士和博士两个阶段。应然说，硕士研究生与本科教育是具有实质性区别的，前者属于专业性拔尖人才的培养，注重的是研究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从实际来看，总体效果并不尽如人意。一些典型的个案已经令人担忧，而本科化的选拔培养方式，一定程度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新型人才的涌现是核心动力。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发展，高校选材育才的改革探索要顺应不断深化改革开放的总体趋势，避免落入方式的单一化。（来源：光明日报，2018-05-23）

中国内地 6 所高校跻身世界大学声誉排行榜百强

英国《泰晤士报高等教育》30日公布2018年世界大学声誉排行榜，中国内地共有6所高校跻身百强，和去年上榜数量持平。

这6所内地高校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其中，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分居榜单的第14位和第17位，和去年一样，在亚洲地区仅次于日本东京大学。

其他上榜的内地高校中，浙江大学位于71至80组别，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位于91至100组别，相较去年排名有所下滑。中国科技大学今年首次进入百强，位居91至100组别。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分别有3所大学和1所大学入选百强，其中香港大学排在第40位，香港科技大学位居61至70组别，香港中

文大学位于 71 至 80 组别；台湾大学位于 51 至 60 组别《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全球大学排行榜总编辑菲尔巴蒂表示，北大和清华在今年的世界大学声誉排行榜上表现平稳，但其他内地高校的排名有所下滑，这表明中国高校想跻身全球顶尖大学行列依然前路漫长。但他认为中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持续投资以及中国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将确保中国大学在未来持续成长。

世界大学声誉排行榜前十名被英美高校包揽，其中美国 8 所、英国 2 所，分别是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普林斯顿大学、耶鲁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和芝加哥大学。今年，美国高校仍然是排行榜上的大户，有 44 所进入百强，其中哈佛大学连续 8 年蝉联榜首。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从 2011 年开始发布世界大学声誉排行榜，作为世界大学排行榜的补充，声誉排行榜更强调高校的品牌价值。今年的排行榜邀请了来自全球 138 个国家和地区的 10162 名全球知名学者参与投票调查。（来源：新华社，2018-05-31）

熊丙奇：不要以高校预算收入多少论“英雄”

按照教育部的要求，75 所教育部直属高校日前都在各自官网上公布了今年预算。清华大学仍是全国唯一一所预算超 200 亿元的高校，而且领先排名第二的高校 100 多亿元。令人意外的是北京大学今年预算大幅减少，导致“百亿高校”的排名发生变化。记者发现，对很多“富裕”的高校来说，其收入中来自拨款的已是小部分，大部分则来自“事业收入”和“其他收入”。

公布高校财务信息，是高等学校信息公开的基本要求。本来，公布预算收支情况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公众了解大学的收入与支出情况，接受公众监督。但高校公布的收支信息，却被一些媒体利用，制作出高校富豪榜，按预算多少，排出高校座次，这其实并不利于高校办学，反而会加剧高校对资源的争夺，以资源多少论学校办学实力。关注高校收支情况，应主要关注收支透明度，以及高校从社会获得捐赠、拓宽办学资源的能力。

对于此次高校公布的预算情况，舆论普遍关注理工科见长的高校预算经费增加，而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院校，经费与理工科见长的高校拉大差距，比较典型

的是清华和北大的一升一降。统计发现，同是国内顶尖高校，清华的预算总经费是北大的 2 倍还多。其支出差别最大的是“教育支出”一项，清华比北大多约 74.5 亿元。而从其他高校看，理工类院校比文科院校富裕是普遍现象。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是全国人文社科类高校的领头羊，但预算总经费都只有五六十亿元。

是不是国家对文科专业就不重视呢？并非如此。首先，需要看懂各高校的部门预算表。北大今年的预算经费少，主要原因不是一般公共拨款收入、事业收入（一般指学校开展教学、科研及其辅助活动取得的收入，主要来自学生学费和科研经费）减少，北大 2018 年的一般公共拨款收入 53.4 亿元，比上一年的 48.8 亿元，还增加 4.6 亿元，而是上年结转收入大幅减少，2017 年预算中，上年结转收入达到 51.18 亿元，而 2018 年预算中，上年结转收入只有 1.63 亿元。也就是说，2017 年的费用基本使用完，转到 2018 年使用的很少。按照北大 2017 年的预算支出，本来准备结转下年的为 47.6 亿元。而清华 2018 年收入预算中，上年结转 72.71 亿元，主要是 2017 年未完成科研项目本年度按照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资金。这并不能表明清华变得更富，而是上年的经费没用完结转的比较多而已。

而谈到科研经费，这是纳入到学校的事业单位收入的，这也不能按经费多少论学校财富，因为按规定这必须用于科研，而不同学科的科研课题经费差距很大，这是很正常的，比如由于自然科学课题有的要大量资金购买设备、材料，因此，自然科学课题经费就往往高于人文社会科学课题。以课题经费论财富，会催生课题经费攀比问题，而忽视研究本身的价值。

在目前按资源论英雄的评价体系中，人文社会科学见长的学校，以及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就会处于弱势。在大学排行中，以人文社会科学见长的高校，排名往往较低，而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在课题经费评价指标方面，也难和理工科学者竞争，由此还影响薪酬待遇。这种强调资源的办学，可能会让大学陷入急功近利，不是按自己的定位办学，而想追求高大全，以获得更多资源，也逼迫大学教授变为课题教授、经费教授，整天围着课题、经费转。

媒体更应该发挥的作用是，监督高校全面公布真实的财务信息，接受公众监督，同时，关注高校教育和学术的真实贡献，而不是功利化的教育和学术指标。

（来源：中国教育报，2018-05-08）

● 聚焦院校

全国 30 所能源类高校“牵手”成立共青团工作联盟

日前，全国能源类高校共青团工作联盟成立大会暨“能源·智慧·未来”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启动式在中国石油大学(华东)举行。会议通过了联盟章程，产生了第一届理事长、理事、秘书长单位，启动了“能源·智慧·未来”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专项活动。团中央学校部副部长宋来、团山东省委书记刘少华讲话，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副校长张玲玲致辞。

宋来在讲话中指出，联盟的成立，是能源类高校共青团组织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和群团工作会议精神，落实《高校共青团改革实施方案》的有力举措，对推进高校共青团协同发展、服务高校“双一流”建设、服务青年学生成长成才具有重要意义。

刘少华在讲话中指出，目前山东省共青团各级团组织正围绕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建设，实施青年建功新旧动能转换行动，新旧动能转换需要高质量人才支撑，希望通过“能源·智慧·未来”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吸引一批优秀青年科技人才来山东工作、创业，为山东新旧动能转换提供智力支持。

张玲玲在仪式上致辞指出，学校党委历来高度重视共青团工作，定当全力支持联盟工作，当好“后盾”，同时希望联盟在团中央学校部和团省委的指导及各成员的努力下，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抓住新时代教育事业发展的机遇，为高校人才培养工作的创新发展锦上添花，为国家能源战略实施和新旧动能转换汇聚青春力量。

全国能源类高校共青团工作联盟在团中央学校部的指导下根据章程开展工作。首届理事长单位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中国矿业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中国石油大学(华东)6所高校，理事单位为成都理工大学、桂林理工大学、河南理工大学、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山东科技大学、太原理工大学、常州大学、东北石油大学、西南石油大学9所高校，全国地、矿、油三类30所能源高校为联盟首批成员单位。

联盟成立后，将举办“能源·智慧·未来”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大赛以“创

新绿色智慧未来”为主题，围绕传统能源转型升级、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智慧能源体系构建、能源经济与战略研究、能源类创业项目孵化等方面，旨在通过对某一能源类实际问题的发现、探索、解决等方面考察和培养大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工程实践能力、发明创造能力和创业管理能力。

据悉，成立高校共青团工作联盟，是团中央主动适应新时期高校共青团工作面临的新要求新挑战，推进高校共青团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联盟将在整合资源、推进改革、服务育人等方面开展工作。（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2018-5-28）

中南大学：推进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

坚持师德为先，夯实信念筑师魂。健全师德评价机制，构建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职能部门协同配合、二级学院具体实施、干部师生共同参与的师德师风建设机制。加强师德评价组织和制度建设，设立师德师风委员会、学风建设领导小组，制定预防和处理学术不端行为办法、关于加强和改进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施意见等，规范教师教学和学术行为。丰富师德考核评价形式，在教师招聘、年度考核、职称评审、岗位聘用、评优奖励等环节实行师德师风“一票否决制”。积极培育和推广师德师风典型，紧扣“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全国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等先进师德评选，挖掘、培育和推广优秀师德典型。

突出育人为本，抓好主业重教学。落实教授给本科生授课制度，所有在职教授、副教授每年必须为本科生至少讲授一门课程或完成所在二级单位高职称教师人均本科课堂教学纯学时数，未完成授课要求不得参与职称晋升和岗位晋级。制定教师课堂教学行为规范、督导委员会章程、检查工作实施办法等多项考核制度，引入督导委员听课评课、领导听课检查、学生评教等考核评价方式，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会等考核教学业绩，根据考核评价内容开展常规和专项检查，及时将意见反馈给任课教师。畅通以教学为主的职称晋升渠道，设立优秀教师按教学业绩晋升教授、副教授职称的专项计划，以教学工作量、教学效果、教学类获奖和教改成果为主要申报条件，设置专项经费支持精品课堂建设、奖励教学成果奖，年终绩效津贴80%用于本科教学，鼓励教师开展教学研究。

注重科教结合，对接需求做贡献。以国家发展和社会需求为评价导向，鼓励教师从事各类科技创新工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主动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对教师业绩评价从“代表作”评价变为“综合材料”评价，包括教学业绩、承担科研项目、专利及其他影响较大的“代表性成果”等。在教师招聘、聘期考核、职称评审、岗位聘用等环节实行同行专家学术评议制度，由同行专家对申报人员业绩进行学术评价。

健全制度保障，激发教师发展力。完善校院两级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发挥二级学院在教师考核评价方面主体作用。成立由各学科专家组成的教师考核评价专家组，对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开展专项研究。实施分类考核，针对高层次人才、新进教师、存量教师等实施不同考核办法和考核周期。根据现有教师队伍结构特点，分别制定教学科研岗位、科研为主岗位、卫生技术岗位、教学为主岗位、技术开发岗位、临床医疗类岗位教师晋升的基本条件和评审办法。建立“五年阶梯式”人才培养模式，设置绿色晋升通道鼓励优秀人才脱颖而出。（来源：中南大学，2018-05-21）

四川大学：打好提高思政课质量和水平攻坚战

以讲好三个“第一课”为示范，将思想政治工作主体责任扛在肩上。召开全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出台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施办法及重点任务分工方案 116 条，把任务量化到岗、责任到人，对思政课等重点工作每月一督查一通报。健全校领导定期听课制度、领导干部讲思政课制度，主要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带头听课督导，带头上思政课、讲党课。校党委书记为新生讲授形势与政策教育第一课，校长为新生讲授开学第一课，知名院士为新生讲授学术诚信第一课，切实以讲好三个“第一课”为示范，让思想政治教育滋润学生心田。

以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质量为核心，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加强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由校党委书记直接联系学院，主管校党委副书记兼任学院院长。深化思政课“123+X”教学改革，实现本科生思政课“中班授课、小班讨论”互动式教学，每门课程每年开设 100 人左右的中班 90 余个，30 多人的小班近 300 个，并努力提升研究生思政课“中班授课、小班讨论”的比例。制定十九大精神“三进”工作方案，联合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兰州大学进行“四校联动”集体备课，大力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想进课堂。坚持用“活”教材，组织编写思政课教学讲义、教师指导用书、学生辅导读物等，系统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注重实践教学，深入开展“8秒正能量”“红动1小时”“五彩石”主题教育活动，大量上线慕课、微课、精品资源共享课，扎实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头脑。

以推进“全课程”核心价值观教育为抓手，拓展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育成果。出台关于“全课程核心价值观建设”的实施意见，将核心价值观教育贯穿培养方案制定、教材选用、课堂教学、课程建设、教学评价等各环节，让全体老师、全部课程动起来，使各类课程与思政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育人良好效应。坚持开设具有川大特色的《中华文化》等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充分发挥“第二课堂”育人功能，举办“青春喜迎十九大，不忘初心跟党走”主题教育活动、“凤凰展翅”文化艺术节、“感动川大”学生新闻人物评选等校园文化活动，坚持以文化人。实施创新创业教育改革行动计划18条，将国家“双创”示范基地打造成实践育人的川大名片。

以打造“1+3”社科研究机构为重点，夯实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学科支撑。大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作为超前部署的一流学科进行培育；增设“党的建设”二级学科博士点，探索马克思主义理论本科专业招生。充分发挥学科和人才优势，成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科技经济学研究中心、中华文化研究院，举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高端论坛，系统研究党的十九大精神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以完善“六位一体”思政工作队伍为基础，强化思想政治理论课建设的人才保障。成立了党委教师工作部，构建完善思政课教师、辅导员、教导员、班主任、学术导师、组织员“六位一体”思政工作队伍体系。选优配强思政课和辅导员教师两支专业队伍，制定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培训方案、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专题培训班方案，明确要求思政课教师年度参加培训不少于8学时、新入职思政课教师不少于16学时，不断提升思政教师讲好思政课的能力水平。选聘退休专家教授和党政管理干部担任学生教导员，选聘学者担任学术导师，协助辅导员做好学生思想工作。全面落实班主任制度，为每个班级配备班主任，推行新进教师担任辅导员或班主任制度。出台专职组织员管理暂行办法，在27个学

院配置了处级专职组织员。（来源：教育部官网，2018-05-25）

清华将启动“写作与沟通”必修课 2020年覆盖所有本科生

人民网北京5月22日电（记者 熊旭）近日，在首场“清华名师教学讲坛”上，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宣布将在今年秋季入学的2018级新生中开设《写作与沟通》必修课，计划到2020年，将这门必修课覆盖所有本科生，并力争面向研究生提供课程和指导。

“《写作与沟通》课程定位为非文学写作，偏向于逻辑性写作或说理写作，以期通过高挑战度的小班训练，显著提升学生的写作表达能力、提高沟通交流能力、培养逻辑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清华大学教务处处长、课程共同负责人彭刚说。

据了解，清华大学对该课程高度重视，还将成立专门的教学机构，组建不少于25名教学系列专职教师的教师队伍，并鼓励各院系不同专业背景的教师共同参与授课。课程采取小班讨论的授课方式，每班15人左右。

写作和沟通能力不足，是现在清华人才培养中有待加强之处，很多校友和师生都提出过开设相关课程的建议。《写作与沟通》课程，就是致力于显著提升学生写作与沟通能力的具体举措。清华大学“三位一体”的教育理念，要求在教学活动中真正将价值塑造、能力培养和知识传授的要素，落实为人才培养的成效。

“一方面是我们既注重写作能力，又强调沟通能力；另一方面，写作水平在很大程度上是思维水平的体现，写作训练同时也是、甚至首先是思维训练。”彭刚强调，“我们希望经过持续不断的努力，开好这门课，让它在今后所有清华学生成长过程中都留下深刻的印记。”（来源：人民网，2018-05-22）

安徽财经大学：借力“新工科”，建设“新经管”

凝聚共识，编制总体方案。建设思路，在全校开展“新经管”建设思想大讨论，围绕“新经管”建设的社会背景、核心内涵、宗旨目标、学科专业建设、人才培养模式、教师教学科研能力、教育教学管理制度等进行交流研讨。出台“新

经管”建设工程总体方案、学科专业建设发展规划等文件，科学组织和有效推进“新经管”建设。

高效实施，落实建设任务。启动新一轮本科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制定关于修订 2018 级人才培养方案的实施意见，内容涵盖重构课程体系、再造课程形式、优化教学模式和革新教学方法等，在低年级基础公共课程模块中增设计算机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基础课程，在高年级专业课程中结合现代信息技术应用调整互联网金融、智能会计、大数据税务管理、智慧外贸等课程教学内容。在相关学科专业依托国家级和省级特色专业、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验区、省级卓越人才计划等平台，瞄准新兴学科方向对专业设置实施动态调整，加快传统学科专业改造。在会计学专业中实施“携手‘中兴财务云’，培养新时代高端财会人才”、“力推‘互联网+会计教学改革’，促进本科教学创新”、“着力培育和引进师资，打造‘新经管’教学团队”三大改革。

聚焦难点，完善保障体系。落实《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做好“兜底线、保合格、促引领”三级专业认证工作，建立健全自我评价、自我完善、自我发展机制，解决本科专业“何去何从”问题。抓好专业评估，建立健全专业建设质量评价机制，把握不同学科专业的共性与个性关系、定位目标与各自内在关联。注重考察各学科专业即时状态，同时考察前景和趋势；注重考察各专业间内在关联及其结构布局，同时考察专业建设与学科引领与支持。把专业评价结果与单位绩效考核等挂钩，学校负责组织设计、考核评价，学院负责组织实施、具体推进。（来源：安徽省教育厅，2018-05-10）

● 纵览全球

国际化——新的声音、想法和方法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们在实践中加深了对国际化的理解。但在全球范围内，国际化的前景将更加广阔，因为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各类机构，以及新一代学者和分析人士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了解高等教育国际化前景的最佳途径是把目光聚焦在来自世界各地的“下一代”国际化专家的观点上，并促使他们研究出新的事物，这些事物将成为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背景。他们还需要去探索出能解释各种高等教育国际化现象的新模式，以及开展各种研究课题去认识和发展该模式。

为什么是“下一代”？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探索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新视角很重要？

从“人力资源”角度来看，国际化研究专家中涌现出一批新的研究专家，他们从当代少量的国际化研究尖端学者和分析专家队伍中脱颖而出。特别是从 80 年代中期到 90 年代初，这些新的国际化研究专家，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并在过去几十年中对国际化研究和分析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简·奈特和汉斯·德·维特等人提出的高等教育国际化定义，对这一领域产生了重大影响，并成为指导世界各地大学和政府制定国际化发展战略的理论基础。

随着致力于国际化研究人员群体地不断演变，研究本身的重点和内容也在不断地演变。因此，我们今天比以往更加清楚地认识到，高等教育国际化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在国家、地区、机构和个人层面都有着多种的解释。随着我们知识基础地不断扩大，我们开始意识到，需要新的视角来引导我们了解和参与全球范围内国际化议程的前沿。

新一代的国际化研究专家能够提出的新观点，并且能够树立全新的认识模式，以重要的新方式来增强我们的参考框架。

新的声音，新的想法，新的方法

我们认为，理解未来高等教育国际化发展的关键在于思考塑造这一现象的“新情境”，发现与其发展和实施相关的“新课题”，以及探索和理解“新模式”的方式。同时，进一步发展国际化研究的维度，以便我们了解影响其未来发展的因素有哪些，我们可以利用这一因素去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

鉴于前面艰难性的变化和挑战性的情景，我们需要为新的想法和新的声音开辟一条带有交流的道路，以鼓励新的问题找到新的解决方案。还需要考虑到新环境将会推动国际化环境的界限变宽——例如，为国际化寻找新的政治和经济背景，或者寻找尚未被探索的文化和地理背景。通过这种方式探索新模式，国际化研究就会向前推进，我们对国际化的研究将会远远超越经典案例研究或小规模调查，而是在全球范围进行大规模数据收集或使用高度创新的研究方法。（来源：世界大学新闻网，时间：2018-6-1）

澳大利亚：教师是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关键因素

国际教育澳大利亚最大的服务出口，2016-2017 年为国家经济贡献了 280 亿澳元。到 2017 年底，在澳大利亚的 799,371 名国际学生中，44% 接受高等教育，27% 接受职业教育和培训。澳大利亚 2025 年国际教育战略确定了到 2025 年国际招生人数达到 990,000 人的目标。

然而，澳大利亚教师在解决国际学生的学习需求方面面临着重大的专业挑战。该领域的专家包括 Betty Leask 和 Jos Beelen 还有 Douglas Proctor 指出，教师是促进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关键因素，并且也会被这一过程所影响。

因此，专业学习和教师应对国际化谈判的专业要求的能力对于国际学生国际化和有效学习的成功至关重要。

Ly Tran 最近完成了由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资助的 DECRA (Discovery Early Career Researcher Award) 项目，旨在调查教师在国际教育变化情况下的专业学习需求和实践。它通过访问 215 名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和培训人员，检查了教师如何能够有效地解决国际学生的学习需求和满足国际化需求。其中 98 位是来自澳大利亚 19 所大学的学者和英语语言及学习技巧顾问。该研究还涉及参与教师专业学习活动。

教师专业学习

我们最近出版的一本书“国际教育专业学习：职业教育与培训部门的实践与展望”以及由此项目引发的关于高等教育教师专业学习的论文将讨论提高教师应对能力的主要领域国际学生的需求和国际化相关的需求。教授具有不同语言，学术和文化特征的学生是一项挑战。高等教育教师反复要求更多的文化能力发展，这些发展背景是关于国际学生的纪律，而不是通常由机构为员工职业发展提供的

普通文化培训。

目前专注于文化多样性的专业发展计划并没有深入到足以为教师提供必要的知识和技能,以解决他们在与国际学生一起工作时面临的复杂的文化相关问题,但是已经做出了很大的努力来帮助教师促进国际学生和当地学生之间的互动。高等教育教师仍然需要的是专业学习,旨在促进不同群体的国际学生一起学习。国际学生本身并不是同质群体,教师需要有针对性的专业学习,为文化多样化的班级创造和培养积极,凝聚力的学习环境。教师还需要与他们将要教授的学生队列相关的背景信息,以便能够做出适当的反应和定制课程内容。他们期望能够利用学生人群不同子群体的跨国文化,语言和知识库,并利用学生的多样性作为资源来丰富全民学习。

特别是,我们的研究表明,教师培训和职业发展计划需要包括教学策略,以帮助国际学生提高英语语言技能,并促进与来自非英语背景的国际学生的有效沟通。这包括国际学生姓名的发音,向国际学生提供课程时简化语言,并促进国际学生的英语普通交流以及英语语言能力,以进行课程特定学习。专业学习非常需要的领域是围绕学科教师和语言与学习顾问之间的合作,在学科学习中嵌入语言,并以教师自身的专业知识为基础,实现优化国际学生的学习体验和成果的共同目标。如果教师装备精良,这种做法在增强国际学生的英语交流能力以及为学科学习做出重大贡献方面可以非常强大。

国际学生的就业能力

该研究强调了正在进行的专业学习对使教师掌握技能和知识为所有学生培养跨文化劳动力市场的重要性。专业学习的关键领域是协助教师发展其帮助学生提高其在日益全球化的劳动力市场就业能力的的能力,包括:了解当地和全球的工作文化;了解当地和国际市场需求;为跨文化和全球化劳动力市场培养学生的知识和技能;在课程中嵌入明确的全球能力所需的知识和技能,并帮助学生建立与全球职场环境相关的联系;促进国际学生工作综合学习的知识和技能;为国际学生安排工作计划;有关如何应对机构,教师和个别学生在寻找工作机会时遇到的挑战的问题;对工作所学生的支持机制以及谈判工作安排的方法以及将真实生活知识带入课堂。

国际教育中专业学习的障碍

我们的研究确定了专业学习提供和参与国际教育的七大障碍。这些都是财务和时间限制，工作人员临时工缺乏一致的体制支持机制和领导国际化的领导，目前的工作量安排没有优先考虑与国际化有关的活动，国际化的价值往往不明确，教师以及所提供的专业发展与国际化所需的不匹配。

研究表明，高校教师通过以下方式调解专业需求并从事专业学习：借鉴自己的经验和资源，解决与国际学生合作带来的新挑战。通过旅行，个人关系，志愿者活动和网络，以往的经历和接触不同的文化是必不可少的资源，虽然这种资本并不总是可用的。通过非正式或正式的指导寻求专业性强的同事和同事的建议或支持。积极调动各种资源，在工作场所寻求学习机会，包括来自同事和国际学生的正式培训和专业发展活动。建立关系并获得国际学生的意见，特别是通过课堂以外的闲谈和参与社交活动。为了发挥日益多样化和扩大的职业角色，教师们开展了自主研究和思考活动，以深入了解并跟上与国际学生相关的不同问题。教师个人对研究和反思实践的推动使他们积累和提高他们在应对国际学生需求方面的经验和专业知识。

然而，个别教师往往只能就与国际学生有关的专业要求进行研究。许多教师的非正式专业学习活动都是以特别的方式发生，处于隔离状态，很少得到认可。

对专业发展规定的影响

我们的研究指出，需要专业发展，重点支持教师发展能力，不仅应对教育日益多样化的学生群体面临的挑战，而且重要的是提高他们在全球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能力，并与国际学生们建立有效的互动关系。

互动关系的核心是建立在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并将国际学生定位为建立跨国知识，技能和能力的更平等的合作伙伴。以国际化为目标的体制支持和领导以及为教师提供现场工作场所专业学习，以促进他们有效应对国际学生的需求，并就国际化的竞争需求进行研究，这对确保国际化的预期结果和影响至关重要。

需要精简和一致的体制办法来促进真正，有意义和可持续的专业学习，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益处。大学必须与专业组织密切合作，例如在澳大利亚的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协会（IEAA），它专门为国际教育工作人员提供专业发展。通过全面的网络，IEAA 提供广泛的专业发展计划，以帮助员工提高国际学生的福利和学习体验，实现国外教学和学习的国际化。

我们的研究强调了建立和维持工作场所环境的重要性，该环境支持来自同事的互惠学习以及自主学习。非正式的学习活动通常是通过同伴协作发起和培育的，但重要的是通过教师的代理和激励。这些非正式的专业学习具有个性化和参与性，在自己的职业环境中构建教师作为积极参与者，并且对教师的直接职业需求更加敏感。

在竞争日益激烈的教育出口市场中，有关教师如何获得专业学习的信息使他们能够有效满足国际学生的学习需求，这已成为大学需要加强的重要资产。大学可以通过与教师本身密切合作，并与国际教育专业组织（如 IEAA）合作，加强教师职业发展的支持和参与。

Ly Tran 是澳大利亚迪肯大学和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未来研究员的副教授。作为国际教育领域公认的学者，她在这方面发表了广泛的文章，并为她的研究赢得了众多奖学金和奖项，包括澳大利亚国际教育协会最佳实践/创新杰出奖。Ly 的研究和出版物可以在这里找到。Truc Le 是澳大利亚迪肯大学的研究员。她的研究兴趣包括跨国学术流动性，教师发展以及课程和教学法。她是“越南高等教育：全球知识经济中的灵活性，流动性和实用性”一书的合作者，此书由 Palgrave Macmillan 出版。（来源：世界大学新闻网，2018. 5. 15）

剑桥大学公布 2017 年招生统计数据

从剑桥大学公布的数字中显示，接受国内教育的学生人数正在增加。2017 年录取人数已经增加到 64.1%（从 2016 年的 62.5% 以来）。这是自 30 多年前开始的可比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最新数据还显示，来自英国高等教育参与率较低地区的学生人数有所增加。Polar3 Quintile 1（高等教育参与率较低的地理区域）的学生入学率已从 3.3% 上升至 4.6%，并且接受自称是少数种族背景的申请人数量的比例也从 21.8% 上升到 22.1%，再创历史新高。从剑桥大学公布的数字中显示，接受国内教育的学生人数正在增加。2017 年录取周期的人数已经增加到 64.1%（从 2016 年的 62.5% 以来）。这是自 30 多年前开始的可比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最新数据还显示，来自英国高等教育参与率较低地区的学生人数有所增加。Polar3 Quintile 1（高等教育参与率较低的地理区域）的学生入学率已从 3.3%

上升至 4.6%，并且使用其他社会经济劣势措施的学生入学率也在上升。并且接受自称为是少数民族背景的申请人数量的比例也从 21.8% 上升到 22.1%，再创历史新高。

剑桥大学招生主任 Sam Lucy 博士说：“令人鼓舞的是，剑桥大学继续在吸引更多来自低参与社区和其他代表性不足群体的学生方面取得进展。这证明了高校和大学在推广活动范围内的努力工作。看到这些数字的同时，我们不能自满。不管背景如何，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以强化剑桥大学对有才华的年轻人开放的信息。我们欢迎来自所有学业能力强的学生的申请，并鼓励他们探索我们在 www.myheplus.com 上提供的免费在线扩展材料，以查看我们的课程是否适合他们的学术兴趣。”

申请剑桥大学的学生总数刚刚超过 17,000 人，相比 2016 年增长了 2.6%，达到历史新高。接受总数为 3,497，增长 1.2%。剑桥大学每年花费 500 万英镑开展外展活动。这些包括在大学的住宿，开放日和访问英国各地的学校。

剑桥大学教育副校长格雷厄姆教授说：“我们非常重视多元化，我们的外展团队也一直在努力挑战剑桥是什么样的这种错误观念。这是对他们辛勤工作的赞扬，让来自不同背景的更多年轻人有机会在剑桥接受世界级的教育。我很高兴，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在这里能找到他们的位置，不管他们来自哪里，或者他们的背景如何。”（来源：剑桥大学官网，2018-5-12）

申请人数下降，美国大学推出全球奖学金

新数据显示，因院校申请中外国学生的人数仍在下降，美国有九所大学为国际学生启动了一项新的奖学金计划。这些院校将从 2019 年秋季开始为海外本科生提供两项年度可再生奖学金，这些奖学金将至少支付领取者 50% 的学费。

该倡议是坦普尔大学的 You Are Welcome Here 社交媒体活动的一部分，该活动于 2016 年 11 月启动，旨在帮助海外学生在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在美国感到受欢迎。这家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院校表示，奖学金将提供给那些致力于通过跨文化交流来推进这项运动的国际学生，跨文化交流将在他们未来的校园和其他地方架起一座桥梁。

申请者将被要求撰写一篇文章或制作一段关于推进跨文化学习和理解的想

法的视频。其他八个参与的院校是：穆尔黑德协和学院，东密歇根大学，詹姆斯麦迪逊大学，明尼苏达双城大学，普渡大学西北校区，西雅图大学，海岸线社区学院和西新英格兰大学。

坦普尔大学国际招生主任 Jessica Sandberg 表示，该运动为美国高等教育与全世界学生之间建立了新的友谊桥梁，而且这项奖学金是我们在桥梁中途与学生会面的方式。它通过采取有意义的行动来推进这项运动，在我们已经收到的信息中增加对国际学生的具体支持，并为这些学生提供了扩大对话的途径。她希望未来几个月有更多的大学加入这项计划。

该计划是作为世界教育服务公司（一家为未来的国际学生提供证书评估的非营利组织）的新研究而公布的，该研究表明，在本学年，大多数美国大学收到的海外学生申请数量都有所下降。

2018 年 2 月对美国 139 所大学的招生人员和专业人员进行的调查发现，在 2016-17 和 2017-18 两年期间，53% 的受访者发现海外学生申请人数的下降。其中 44% 的受访者表示申请数量下降了 10% 以上，来自中国，印度，中东和北非地区的申请人数量降幅最大。71%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政治环境是导致签证数量下降的主要原因，其次是签证延期或拒签增多。（来源：泰晤士高等教育，2018-05-30）

大学分数通胀问题正在向全球蔓延

从爱尔兰到印度，大学的高分率陆续成为了头条新闻。可见，大学的分数膨胀问题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少数几个国家，而开始渐渐蔓延至全球了。

近几十年中，全美高校学生的平均绩点始终处于不断上升的状态。通过 Gradeinflation.com 对美国 400 所大学所进行的长期数据分析可以发现：每隔 10 年，获得 A 等级的学生人数就会出现 5% 到 6% 的上涨。这意味着，如今获得 A 等级的学生人数是 60 年代时的三倍。

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康奈尔大学等美国常春藤盟校中，尖子生的出现也越来越频繁。2001 年，哈佛大学某委员会就曾指出：对于学生成绩的中等评分是 A- 等级，然而我们最终却发现获得 A 等级的学生人数最多，可见分数膨胀这一十分严峻的问题已经出现了。2004 年，为解决分数膨胀问题，

普林斯顿大学决定对本校的评分制度进行改革。由此，大学的学生分数和评分政策也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

在多伦多大学和滑铁卢大学等加拿大高校中，也不乏分数膨胀的现象。学生成绩的不断上涨，似乎已经成为了不可逆的发展趋势。在英国，大学的分数膨胀问题也成为了备受关注的热门话题。官方数据显示，目前有近四分之三英国本科生的成绩都处在一等或二等的行列之中。相较于去年，这一比例增长了 15%。同样，德国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2012 年，德国科学与人文理事会 (German Council of Science and Humanities) 正式报告了德国大学分数膨胀的现象。该报告显示，近 80% 学生的成绩都处在前两个等级中，而 2001 年时这一比例为 70%。这使得德国大学的评分标准一时之间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其实，大学的分数膨胀问题并不仅仅出现在西方社会的大学制度中。韩国教育部和韩国大学教育委员会于 2015 年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在韩国的 178 所大学里，每 10 名大学毕业生中就有 9 名获得了至少 B 等级以上的成绩。《朝鲜时报》报道说，“轻易相信学生在大学里的学习成绩是有风险的”，“这是一个问题，目前为止还没有能够快速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

那么，分数膨胀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

在媒体和公众对这一现象产生强烈反应的背后，隐藏着一系列复杂的问题——一些是针对教育体制和国家背景的，而另一些则是普遍意义上的。而这其中作为重要的问题，就是真正弄清楚，在何种情况下，学生的分数提高是与学生的表现优良相符合的；在何种情况下，学生的分数提高只是由于评分标准弱化而造成的。

例如，分数的上升并不能完全证明分数膨胀现象的存在，因为仍有一些合理的理由能够解释它——包括教学方式的改进、学习资源的优化、学生更加积极努力地学习，等等。甚至还有些人用弗林效应 (Flynn Effect) 来解释这一问题，即后代的平均智商总是会超越前一代人类，因此他们在教育方面所获得的成就也自然比前一代更高。

然而，有人却认为，分数膨胀是高等教育领域被国际商业市场破坏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全球学生竞争十分激烈的当今时代，大学将学生视为消费者。批判家认为，

在这种情形下，大学的评分过程已经受到了影响。因为大学会出于满足其“客户”的需求以及用优秀毕业生的声誉来提高自身院校排名的目的，盲目而虚假地提高学生成绩。此外，“高分约等于高就业率”这一规律，也被大学用来强化自身的价值定位以及它们在竞争市场中的地位。所以，一些人自然而然地认为，为了帮助学生在竞争激烈的就业市场中脱颖而出，夸大其成绩是十分必要的。

可是如今看来，这种做法并不能够真正帮助到毕业生，反而可能会使毕业生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当所有人都知道学生们所拥有的成绩是经过学校“膨胀”处理后的，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成绩在劳动力市场中作为传递学生能力的信号将会随之不断减弱。

这就引出了第二个关键问题——分数是什么？是衡量学生学识和技能的尺度吗？还是向未来雇主传达学生表现的一种方式？

而第三个值得考虑的关键性问题就是，既然分数的虚假上升已经令外界对高等教育领域的诚信提出了质疑，那么到底应该由谁来负责解决这一问题并挽回外界对高等教育领域的信心呢？

英国政府认为，完全给予大学自由权利从根本上是不利于解决这一问题的。因此，英国成立了一所新的监管机构——学生办公室(Office for Students)，该机构将有权对不符合行业标准的大学采取相应的行动。

对此，大学自治的拥护者可能会深感不安。但是，在竞争对手的学生分数不断提高的情况下，让任何一所大学单独降低自己学生的分数是难以实现的，因为这从根本上有损它的利益。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管理可能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如果英国的做法获得成功的话，其他国家可能会选择从中学习经验，以改善本国的问题。（来源：大学世界新闻，2018-05-25）

印度：通往可持续发展的一流大学之路

印度是世界第七大经济体，在多个科技领域取得了进展。但缺乏一流的大学来向世界展示国家技术和经济实力，是十多年来一直未能实现的梦想。

印度政府最近拨款数千亿卢比（数百亿卢比或数亿美元）来支持一流大学建设，但这是否会奏效？在传统的世界一流大学里，都具有鼓励创新创业的科研和实践文化，如何更好地培育这种文化？

泰晤士报高等教育（THE）2018 年世界大学排名，尽管印度仅有几所高校入选，但是这个国家还是很有潜力的。印度有两个科研机构在 THE 排名的 251 名到 400 名范围内，一个是印度科学研究所，另一个是印度孟买技术研究所。此外还有 40 所印度高校和科研机构有潜力进入 500 强。

政府应考虑通过设置一系列目标来提高排名表现。其主要目标或许是将重心放在印度这两所顶尖研究机构上，使其进入前 100 名。要做到这一点，他们最高平均分应达到 60-65，而目前的平均分在 40-45 左右。第二个目标是将其他 40 所大学从 500-1000 的排名中纳入前 500 名。这些大学的总分在 9 到 30 之间，他们至少需要 55 分才能进入前 200 名，或者 35-40 分才能进入前 500 名。这在未来几年可能会通过政府的努力和投资来实现。

实现这些目标有短期和长期的方法。为了建设一流大学，政府不必区分公立还是私立大学，而应该把重心放在创建一流的科研基础设施，以及提高印度业界对于创新重要性的认识。政府需要与行业联合投资研发。中央财政和科技部门要通过新税制建立国家科研专项基金，并在分配资金时实行问责制。

短期的行动

首先，政府应该给与这些顶尖机构特殊地位，赋予他们特殊的名字、通过专项法律赋予更大的自主权，以纳入统一的管理中。政府要设法让跨国企业、印度国际组织支持这些机构的科研项目。而且，所有在印度工作的国际和跨国组织都应该向这些机构提供一定数量的研发项目。政府应该为获得项目的教授、学生或团队，以及出版商、博士等提供激励，这些举措会逐渐改变大学的文化。接受那些通过欧美国家认可的 GRE、托福、SAT 和雅思等标准考试的非印度裔国际学生，而不是要求他们通过印度考试。大学应该录取那些可以用英语顺畅交流的学生。为国际学生设立达到或超过国际标准的政府专项奖学金。允许国际学生（本科、硕士、博士）在这些大学进行短期或长期的学习，印度本土的学生也可以到国际上其他大学，特别是世界 100 强的大学进行学习。各大学必须创建符合国际标准的教室，教具和实验设施。投资应该用于为师生建设符合国际一流标准的食宿设施。外籍教师应基于 3-5 年的终身教职进行任命，提供符合国际标准的薪酬和津贴。鼓励聘请那些从世界一流大学退休的教授任教于印度国内的大学。提高大学的师生比是另一个挑战。这些顶尖大学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任命的过程非常漫长并

且薪资很低。

第二，这些大学必须想办法聘用当地的教师，给与初级的终身教职，并培养或资助他们进行博士或博士后学习。超过 60%-70%的世界一流大学教授被授予终身教职，印度可以采用类似的办法。在世界一流大学的排名中，有一些印度私立大学有能力达到国际水平，但他们面临诸如不受限的准入门槛、缺乏政策和资金支持等挑战。因此，政府应该设法像对待公立大学一样对待私立大学。国家和中央政府部门以及公私企业应该大量推出并资助这些大学的工业合作计划，企业应该为这些大学提供项目和资金。印度国内所有教育机构都应该按照国际标准改善师生比。消除各级教育系统的政治干预，增加人均教育和研究支出。

长期的行动

组建由不同领域专家组成的印度“国际委员会”。该委员会可以访问众多世界一流的国际机构。委员会应该存在至少 10 年，并包含外国专家。印度体系要从国际理念和国际标准中学习产品的创新。所有大学都应该设立拨款和捐赠基金以长期维持这些活动。中央政府要设法逐渐增加拨款。应该向那些为该计划做出贡献的人提供免税计划。所有大学都应该能够举办知名人士的国际讲座。设立一个专门研究世界一流大学质量和效能的研究中心。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特别是在经济开放以后，印度已成为大学生数量众多的国家之一。现在是重新思考和关注教育质量的时候了。仅仅靠砸钱不可能达到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从长期来看，只有借鉴国际办法来进行创新创业，才能实现世界一流大学的精英地位。（来源：大学世界新闻，2018-05-18）